

论新时期性反抗小说及其政治生命观念

刘智跃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 湖南长沙, 410002)

摘要:新时期性反抗小说以性欲描写表现性别隐喻和权力隐喻的内涵。性别隐喻小说追问男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表达了反抗男权文化压迫,争取女性性别自觉,建构女性话语的价值取向。性权力隐喻小说以性描写隐喻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的潜在影响。性反抗小说通过性别反抗和权力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注,倾注了向往生命自由和独立幸福的愿望。

关键词:性反抗小说; 政治生命观; 隐喻

中图分类号: 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2-0257-06

—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在阐释导致女孩性压抑的中心概念——女性俄狄浦斯情结时是非常不明确的。伊格尔顿认为:“应该坦率地说,弗洛伊德作为男性统治的社会的代表,当他面对女性性行为——他曾称作‘黑暗大陆’——束手无策的时候,表现得最为典型不过了。”^[1]原来弗洛伊德在研究人类性欲时,是以男性性欲为对象的。这无意之中暴露的文化立场却泄露了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即男性压迫女性的事实。不仅如此,弗洛伊德在一系列有关妇女心理的论文中,对女性性心理表现了赤裸裸的歧视。

尽管作为性别反抗的思想最早从18世纪末开始就被女权主义者作为颠覆既有传统的目标提出来了,但是直到20世纪初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潮,性别反抗仍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理论建构非常薄弱。性别反抗的文化理论之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时才完善,是因为它终于找到了可资转化和利用的思想资源。其中之一是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理论不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工具及可供批判的靶子,也提供了发展女权主义理论的可能性。”^[2]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的经典著作里都有对精神分析原理大量吸收、运用和转化的痕迹,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精神分析的概念甚至直接进入到它们里面,不做改易地

被运用。

性别反抗主题是性反抗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性别反抗中“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的思想为一般意义上的性反抗小说所吸取。但是性反抗小说和女权主义小说并不完全等同。从理论来源说,女权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除了与精神分析有关,还与现代后现代许多其它理论有互动关系,而性反抗小说只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范围内被讨论。凯特·米利特从八个方面分析了性别政治形成的原因^[3]。它关注性别之间的社会关系,目的是实现男女平等。而性反抗小说从生命角度切入,探索文学的性行为描写中表达的生命与权力的关系。它既可以是性别之间的,也可以是非性别色彩的。女权主义讨论性别冲突的角度主要是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而性反抗小说则继续超越意识形态层面,表现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性反抗小说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吸收还表现在对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语言无意识理论的化用上。在精神分析学中菲勒斯被认为是父亲的隐喻与象征,它是由围绕着男性的生殖器官构成的。儿童认同它,也就是认同了他人的欲望,认同了父权制社会和社会文化秩序。女权主义者希望凭着女性的书写,向以菲勒斯为代表的上帝、国家、父亲、法权符号挑战,解除它们对女性的压抑。性反抗小说则力图推而广之,指出以菲勒斯为象征的社会秩序对人的压抑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既定文化秩序对人的控制是借助于语言符号的能指作用来实现的,伊格尔顿说,进入语言之中,

收稿日期: 2008-08-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07B039)

作者简介: 刘智跃(1968-),男,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影视。

作为主体的人就变成了欲望的客体,成了他者的存在。阿尔都塞在分析主体人的心理特征时指出,人是通过个体外在的东西——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地”建构起来的。这种关系表现为:“①个人不是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而是它的‘承担者’或‘效应’;②主体的主体性是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4]性反抗小说基于这种认识来表现人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生命观念之间的关系。

归纳起来说,性反抗小说有这样两个特点:①它是描写性欲的小说;②它表达生命的现实境遇,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即性心理和性行为在隐喻的层面上显示了意识形态对生命的权力关系和生命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关系。它包括新时期部分女性主义小说和男性作家王小波、毕飞宇的一些小说等。波伏娃说:“弗洛伊德的正确之处在于证明了生存者即肉体的事实——作为一个与其他肉体相区别的肉体,生存者的感觉具体体现了他的生存处境。”^[5]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存在主义对女性理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根据对“肉体的事实”的态度,我们可以把性反抗小说分成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性别隐喻小说。指女性主义小说中的涉性小说。写女性的性经验并用以反抗父权制压抑和压制的政治生命主题的小说。陈染、林白,以及卫慧、棉棉等一批女性主义作家的部分小说就属于这个层级。第二个层级是性权力隐喻小说。这些小说在普遍意义上表达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表现生命在实现过程中与外在压迫的认同、消解或者逃避、反抗的关系。

二

在男权制度中,社会价值尺度和评价准则以男性为唯一标准,女性性别存在是被忽视的,因此性别隐喻小说首先要复苏女性的面目。在性偏执小说中,虽然已有女性性心理描写,但它还缺乏性别自觉意识。而在性别隐喻小说中,对女性身体美的欣赏和对性爱的自由表达是女性的自我抒发,女性依靠自我书写表达存在。戴锦华说陈染的重要小说“大都有着第一人称的女性叙事人”^[6]。与这种性别叙述相应的,是女性形象在小说中取得了主体地位,而男人沦为了美的“他者”角色。陈染《潜性逸事》中,妻子是这样感受丈夫的:“这个时候……她只需要他像一个男人那样去动作就够了。”在《潜性逸事》《与往事干杯》《凡墙都是门》等小说里,都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的肯定。性别隐喻小说中女性的主体姿态与男性作家暴露性别差等与同情

女性遭遇是有重要区别的。女性主体姿态是女性的自我肯定和承认,她不附加任何它者的条件,而男性作家的性暴露小说中对女性的同情是以牺牲女性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它仍然是男性的视角和思维。后者在语言书写上同情女性,而在内在本质上,它恰恰是对女性人格和价值的贬抑。

复苏了的女性以主体的反抗姿态创造自己的话语空间。在《空心人的诞生》中,女人明确地说:“我不需要男人。”在《嘴唇里的阳光》中,男性的伤害引起了女性心理无意识的创伤。在《无处告别》中,黛二小姐之所以把自己幽闭起来,是因为她感到社会、生活中处处都是男性控制着,女人“无处可逃,也无处告别”。在性别隐喻小说中,经常有追求同性爱的勇敢者,这也是对男性男权的一种反抗,如陈染《空心人的诞生》中的紫衣女人和黑衣女人,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南丹,《瓶中之水》的意萍,《回廊之椅》中的朱凉和七叶等。激烈的女性主义者常常采取极端的弑父方式,以反抗男权和父亲的符号菲勒斯,如陈染小说《麦穗女与守寡人》《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以及林白《致命的飞翔》中,女人都将欺骗和折磨她的男人杀死了,以表示对男性控制的不满和反抗。

反抗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女性话语。这表现为女性大胆的性暴露和对自身欲望的率直表述。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五六岁开始就有了性欲望,并常常手淫。《随风闪烁》里的红环,“不要爱情,她从来没要过爱情,爱情对她来说是奢侈的”。在《致命的飞翔》中,北诺明知道秃头男人对自己有肉体要求,但她的态度却非常坦然:“这不是一场性交易,而是她生理的需要,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尽管饭不好,还是可以吃的。”《私人生活》第一次较全面地写出了女性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的性别自觉和性别反抗意识的逐步形成,开拓了性别隐喻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话语深度。

在生命意义上,性别反抗并不是反抗作为肉体的男人,它更多的指向隐喻层面上的政治意义,作为反抗对象的男人是在文化和社会秩序的象征层面上被使用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说,女性主义写作就是把“女子的身体、女子的差异刻入语言和文本的行为”^[7]。这句话的意思是,女性书写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是文本的表达形式,它在更深的层次上是要颠覆父权制文化等级秩序或男性中心主义的象征秩序。陈染在《走不出来的九月》里,反复哀叹“父亲们,你挡住了我”。在《麦穗女与守寡人》中,犯了杀人罪的“我”面对男性法官,辩白的理由是:“你是男人,所以你无法听懂。”《站在无人的风口》里,她认为“世界悲剧

性的结构”是由于“两个男人终生的格斗厮杀，最终使她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男人是“存在”的“不存在”，而女人是“不存在”的“存在”，历史记录恰恰是不存在的前者。整个世界和世界文化就是这样“荒谬绝伦”。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结尾这样写道：“多米十九岁时因为剽窃，三十岁时因为嫁人，她也曾两次遭到社会的拒绝。”小说的特别之处，是作家对这件事情的叙述态度。作家将性别问题与剽窃偷盗、坑蒙拐骗这样的道德问题相提并论，表明了她小说中性别隐喻的含意和指向。

从新时期文化环境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市场化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比较淡化，市场意识形态气势渐浓。以强烈的政治面目出现的性别隐喻小说客观上是靠市场推动的。在它的政治意义与市场结合的点上，性欲理论已经变成了消费资源。因此，性别隐喻小说兴起的原因主要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推动的结果，但它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论和思想论，而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和政治行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国的女权主义小说的出现缺乏合理的现实冲动。而尤其如此，90年代性别隐喻小说以“个人化写作”为主要形态甚至是“私语”面目出现是必然的，它既袭取了性别反抗的营养，给女性书写带来了全新的社会主题，又以女性心理和视角的消费性占取了市场生存空间。戴锦华认为个人化写作主要有两种层面，第一，它是“从个人的视点、角度去切入历史。据我的理解，一个从颇为个人的视点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的想象图景上的裂隙”。第二，“针对女作家，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权社会和传统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8]我认为，个人化写作表达的性别反抗方式观注着极其强烈的女性生命主体意识。她们的小说，写出了女性的性别自觉，女性对性生理心理的体验，女性心理、情感、存在的独特方式。半自传的性質赋予了小说更多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也是女性小说对市场 and 消费的一种巧妙利用。

陈染的小说塑造了黛二、倪拗拗、肖濛、老女人、守寡人、秃头女、巫女等一批离异、寡居、幽闭、孤独的女性系列。她们生活在男权社会里，时时感受到妇女被压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事实，她们不满这样的社会文化秩序，选择离异，宁愿寡居，表达了激烈的反抗姿态。她们大多有着坚强的、固执的甚至病态的心理。林白塑造了多米、蓼、姚琼、红环、朱凉、李

葛、北诺等一些性格孤独、刚毅、自我、不幸的女性形象。她们不堪男权社会给定的屈辱定位，努力规划自己的社会地位，寻求价值实现，却往往遭到拒绝，甚至被迫害。她们的小说，有着一一种给定的悲剧结局和无法排解的沉重气氛，我们可以触摸到反抗态度的激烈，反抗行为的无奈，嗅出人物命运的悲苦，体验到女性主体的凄怆内心。到了卫慧、棉棉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女性话语反抗的极端方式和性别隐喻的极致。

三

卫慧的代表小说《上海宝贝》《欲望手枪》《床上的月亮》《蝴蝶的尖叫》《像卫慧那样疯狂》和棉棉的代表小说《糖》等的性别隐喻，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是彻底的弑父倾向。父亲缺席了，他要么死了，要么离异不在身边。偶尔双亲和睦父母健在的，主人公也会选择离家出走，逃避家庭约束。如《上海宝贝》里的一批年轻人，倪可是家庭完好自己搬出来另住的，天天的父亲死了，妈妈远在西班牙，朱砂父母不在上海，马当娜16岁就逃出了父亲和哥哥的掌控，李乐是只身在上海。《蝴蝶的尖叫》中的朱迪10岁父母离异，跟在上海外婆家长大。《像卫慧那样疯狂》中的卫慧生父早就自杀，继父和母亲住在远方的小镇上。《糖》中的主人公“我”“来自破碎家庭”，中学没念完就离家出走在外唱歌过生活，赛宁自己在中国，母亲则在日本，父亲在英国。谈谈是有父亲的，但他总是骂他，当着人的面也骂，“你是我爹我们可以在一起喝酒，但你千万别教育我”。还有一大批年轻人都是没有背景的，仿佛石缝里蹦出来的石猴子，他们独自存在，他们无父无母无家无亲人。这种态势的父子关系，从根本上剔除了父亲甚至家庭的影响和教育。其次，是女强男弱的性别关系。《糖》中的女孩红说，“我总是唱美国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对于它们有着“古怪激情”，表明自己是很反叛、很另类的女权主义者。这些年轻的女孩，心气颇高，追求成功，米妮(《欲望手枪》)、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倪可(《上海宝贝》)都是作家。天天说倪可“你有很强的进取心”，“你天生是作家的料子”，倪可也认为自己“有朝一日可能会推也推不掉地成为名女人”。与她们同居的男孩则显得软弱、服从，她们把他们踩在脚下，或者将他们运于股掌之中。想爱就爱说分就分的都是女孩，分手时痛哭流涕欲生欲死的总是男孩。他们之间，女人总是处于更强势的一方，更坚强的一方，占心理优势的

一方,甚至会成为男性的港湾和保护。在《上海宝贝》中,天天对倪可说:“我们是两种人……你是精力充沛,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女孩,而我则是无所企求,随波逐流的人。”天天离开倪可到海南旅游,结果吸毒堕落。又因为倪可另有情人,天天伤心失落之下无可寄托,重新寻求麻醉,最后丧命。第三,是女性中心的情感模式。她们在小说里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女性成了世界的统治者,男性是她们的附庸,是她们的欲望宣泄的对象。《糖》中的“我”在赛宁离开后,说:“我不能不做爱,我得找新的男人。”“我”十九岁和白脸做爱,“后来我有了赛宁,就再也不想白脸了”。“我”喜欢赛宁和她口交,“我的身体只喜欢他的嘴唇,我只要这个”。赛宁走后,“我”吸毒,“我开始和不同的男人睡觉”。他们有“我”的高中同学奇异果,有后来死在“我”房间里的谈谈,还有巧克力等等。《上海宝贝》里的倪可说:“女人在喜新厌旧上一点不输于男人。”《像卫慧那样疯狂》中的卫慧说:“人们一般都有这样的常识,一对同居的男女中如果有人迫不及待地提议结婚,那么这人几乎肯定是女的,而我跟他之间却奇怪地颠倒了。”马格向她求婚,她没有答应,他跟她吵翻了,她当即出走,结束同居生活。但只要需要,他们还是无拘无束的约会,做爱。倒是后来马格因为结婚了,不敢应诺她,先行退缩了。

从写作姿态来看,如果说陈染林白们是反抗姿态的,那么卫慧棉棉们则应该是建设姿态的了。但由于性别隐喻小说主要靠市场维持和推动的性质,决定了它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实践。她们是反抗的巨人,建设的矮子。性别隐喻的政治倾向对价值判断无可逃避,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性别隐喻小说却失语了。李银河说:“关于在性别关系中争取平等和保持差异的论争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9]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卫慧棉棉们。我们看到,卫慧棉棉们的性别反抗,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性别循环认同的误区,也就是说,卫慧们建立的女性话语又宿命般地回到了她们的对立面男性话语的旧思路中。极度的放浪形骸,一女多男的情感模式,女性对男性的操纵呓语,惊人地重复着男权社会里的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关系宿命。正因为这种倾向,自称反抗的性体验性描写就很可能沦为男性欲望心理的消费品。当女性主义者书写自我恰好满足了男性久已饥渴的窥私心理,性别反抗的归宿又将何去何从呢?这是不是仍是对男权话语无意识的拙劣认同呢?它诉求的结果岂不又在无意中符合已经成为了性别图腾的男性心理需要?性别隐喻小说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是到了要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四

林白说:“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两者有时候是重叠的),这二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①性别隐喻小说更多反抗男权叙事对女性生命的“覆盖”,性权力隐喻小说则更多反抗主流叙事对个人生命的“覆盖”。拉康从语言的角度解释了,性的生命价值要获得作为意义的单位,首先要成为语言符号。所以,性这种最私密、最个人化的生物行为,事实上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性权力隐喻小说以性描写隐喻了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的潜在影响及其在语言符号层面所表达的象征意义。

毕飞宇的《玉米》是一部比较好的性权力隐喻小说。整篇小说以王连方拥有权力(当村支书)和失去权力(当农民)分为前后两部分。有权力时,王连方想睡村里的哪个女人,哪个女人就归他,权力使得王连方胆大妄为,无所顾忌。他和有庆家的正在床上做爱,男人有庆回家撞见了,王连方并不停止做爱,而是要有庆在外歇会儿,就快好了。

因为有父亲的权力做后盾,玉米的爱情得到了彭支书的关心。普通的玉米才有被介绍给神圣的飞行员的荣耀和机会。

随着王连方失去权力,原来的女人再没有一个人理他。接着,彭国梁和玉米告吹了。再后来,玉秀和玉叶被人轮奸。失去权力的家沦为尽人可欺的病马。在深刻的事实面前,玉米终于深刻地醒悟到了权力的重要,她决心将自己年轻的身体作为本钱赌出去:“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育!”最后,她终于实现了将性向权力依附的愿望,嫁给了郭家兴——一个权力比她父亲更大的人。

和《玉米》以文革为题材一样,怪才王小波也以文革生活为题材写下了《黄金时代》等一系列性权力隐喻小说。毕飞宇的小说揭示了权力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对生命无所不在的控制。在权力万能的社会中,它无论怎样扭曲生命都会获得认同。这类小说使我们触摸到了社会深层的乖戾、麻木和丑恶。王小波的小说则有更多的生命自觉,作家将自我生命认识贯注到小说主题和人物形象中去。《玉米》是再现性的,《黄金时代》则是表现性和象征性的。

和王连方不同,王二和陈清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权力,他们是权力筹码下被重压着的蚂蚱,过着无法自保的生活。小说一开始,陈清扬就来找王二讨论她

是不是破鞋的问题。破鞋与否的问题应该是事实问题，而不是逻辑论题。陈清扬不是破鞋，但是被人说成是破鞋而自己又无法也不能辩解的困境其实是权力作为符号起作用的隐喻。

与陈清扬企图对抗权力的态度不同，王二从一开始就对它采取了消解姿态。他劝说陈清扬当破鞋，自己也搞破鞋而故意弄出事情来。王二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王二有对权力的清醒认识和消解它的主动意识。从表面上看，他是受迫害者，但实际上他做出了在权力无所不在地压迫生命时的最佳选择，不但避免了自己受伤，而且还可以逍遥自在地生活。因为交代材料带给领导的只是意淫的满足，而他们自己则得到了真正的性爱和幸福。首先，他们的身体心理都没有太吃亏，享受了人生“黄金时代”的性爱，摆脱了压抑，克服了变态。到了九十年代，他们的身体“还是老样子”，他们还是朋友。于是，“我总结道，那时人家要把我们锤掉，但是没有锤动。我到今天还强硬如初”。于是，“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是她的黄金时代”。

那是一个无性的年代，传统道德习俗对性的重压远未消除，革命时代的阶级关系又为它加上了严肃的政治含义。但是无性的状态却恰恰使人们产生了变相的性满足，权力对性的控制正是权力赤裸裸的意淫。正如陈清扬，因为她没有答应军代表的性要求而遭整，被下放。又因为她不符合大家认为的结了婚的女人的标准，于是被毫无道理地称为破鞋。“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性权力隐喻着一种改造人的法则，就像掌锤队长用阉牛的譬喻说的那样：“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改造就是阉割，权力就是要求你服从阉割。

明白了权力扭曲生命的这种性质和意义之后。他们反而释然了。既然“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那就只有“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们就开始做爱，故意成为破鞋，造成男女关系问题的事实。当一个社会衡量人的标准是人必须拥有那个时代认为的问题，必须成为人人瞩目的问题人物才能生存的话，这个社会的荒诞和悖谬就可想而知了。

但这样一种性爱只是由于做爱者的清醒和自觉，才有了内在地反抗权力的意义，否则它就会落入愚昧和驯服的陷阱。相反，如张贤亮说，文革中自杀的人，“究其原因，的确全是由于思想抵触，委屈抱怨，对加于自己的罪名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悬梁觅井了；相反，认罪知错的人，却会乐天知命，任杀任剐，任打任罚，

从而也就玩世不恭地活下来了。”^[10]张贤亮在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的罪感中不敢自杀，是受制于权力的驯服心理，而王小波却对权力表现了更多的清醒。他知道领导手中握的是权力，就是要你服从它。只要你表面上臣服了就行，真正内心的东西是无人关心的。他在《黄金时代》中塑造的王二，领导要他写材料时，他就不断添加着“出色”的成分。领导说这是案子，他就写“作案”。陈洁杨呢？也是这样的。领导说斗破鞋，她就把破鞋挂在脖子上。知道有人会后面揪头发，“她把头发梳成两缕”，特别方便。

如果说性别隐喻小说表现的是性别层面上的权力关系，性如何因为性别的原因而被权力扭曲，得不到平等对待的机会，那么性权力隐喻小说则直接将性展现在权力的控制之下。这样说来，性权力隐喻也是性别隐喻的扩展和一般化，性别隐喻是性权力隐喻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展开方式。这种权力关系涉及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反映了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现实和生命的存在处境。性反抗小说通过性别反抗的话语方式和权力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注。在生命与权力的两相权衡中，倾注了向往生命自由和独立幸福的愿望。

注释：

- ① 这是1996年7月林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沟通：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会议上的发言稿。见林白《猫的激情时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301。

参考文献：

- [1] 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原理引论[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84.
- [2] 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49.
- [3] 凯特·米利特. 性的政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0-88.
- [4] 孟登迎. 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32-133.
- [5] 西蒙·波伏娃. 第二性[M].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23.
- [6] 戴锦华. 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318.
- [7] 肖沃尔特. 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M]. 最新西方文论选[C].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262.
- [8] 戴锦华. 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197-198.
- [9]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1.
- [10] 张贤亮. 满纸荒唐言[J]. 飞天，1981，(3)：79-82.

On the sexual-resistance novels in the Chinese new period and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life

LIU Zhiyue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 Changsha 410002, China)

Abstract: The sexual description of the sexual-resistance novels in new period show the meaning about gender metaphors and power metaphors. Through the depressing from male-oriented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he gender metaphors novels mean resistance to it, and buil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women discourse. The sexual-power metaphors novels describ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deology and power operation. The sexual-resistance novels against gender and power through the metaphor of the way reveal the concern for life, freedom and independent wish.

Key Words: the sexual-resistant novels;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life; metaphor

[编辑: 汪晓]

(上接 250 页)

- | | |
|---|---|
| [4] 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M]. 徐辉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8] 孙家正.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文化责任[N]. 光明日报, 2005-08-05. |
| [5] 苗文利. 重建我国大学理念应坚守的基本原则[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教版), 2007, (4). | [9] 梅贻琦. 大学一解[J]. 中国大学教学, 2002, (10). |
| [6] 中共中央.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06-10-19. | [10] 范笑仙. 和谐文化建设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使命[J].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2). |
| [7] 周远清. 和谐文化建设与中国高等教育[J]. 中国高教研究, 2007, (3). | [11] 杨福家. 当代大学的使命与大学生的责任[J]. 世界科学, 2006, (6). |

University's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in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MIAO Wenli

(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ies exercise important functions to lead culture innovation born that way. We are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harmonious world today, so to build harmonious 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building advanced culture. Universities should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in building harmonious culture. Universities take on leadership in building harmonious culture by making the choice about culture, cultivating students, and building modern notions of running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harmonious culture; responsibility; mission

[编辑: 汪晓]